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2 年 2 月 7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朱幼麟議員，J.P.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J.P.

陳智思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J.P.

楊孝華議員，J.P.

楊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B.B.S.

劉江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G.B.S., J.P.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羅致光議員，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鄧兆棠議員，J.P.

石禮謙議員，J.P.

李鳳英議員，J.P.

胡經昌議員，B.B.S.

張宇人議員，J.P.

麥國風議員

梁富華議員，M.H., J.P.

勞永樂議員

葉國謙議員，J.P.

劉炳章議員

余若薇議員，S.C., J.P.

馬逢國議員

缺席議員：

丁午壽議員，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許長青議員，J.P.

陳鑑林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劉千石議員，J.P.

霍震霆議員，S.B.S., J.P.

陳偉業議員

黃成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J.P.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G.B.S., 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J.P.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J.P.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J.P.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G.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局局長葉澍堃先生，G.B.S., J.P.

環境食物局局長任關佩英女士，J.P.

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J.P.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J.P.

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女士，J.P.

工務局局長李承仕先生，J.P.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尤曾家麗女士，J.P.

經濟局局長李淑儀女士，J.P.

規劃地政局局長曾俊華先生，J.P.

署理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勵超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立法會發言，並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會先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女士，首先，我想就李柱銘議員昨天的言論作出回應。李議員昨天的一番話歪曲了事實，我想作以下的回應。香港回歸前擁有的優勢，在回歸後是依然存在的，其中包括廉潔的政府、公平的營商環境和法治的精神。正因為我們落實了“一國兩制”，保持和發揚了香港這些優勢，才能使海外投資者來香港投資，也吸引移民海外的香港居民，回港安居樂業。

至於說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的管治哲學有沒有改變，我想告訴李議員，香港面對着外圍經濟下滑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內地急速發展所引發的經濟結構性轉型的重大挑戰。我們的競爭對手越來越多，而他們給我們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我們不能再故步自封，因循以往的辦事方式而希望情況會自動好轉過來。整個社會要有新的思維，才可以把香港的優勢和香港人的潛質發揮出來，克服困難。在經濟困難的時期，特區政府要更多關懷弱勢社羣，團結各階層，加強社會凝聚力，建立信心，為香港未來的發展奠定明確的目標。我會要求所有政府部門以積極進取和新的思維來服務社會，以及時時刻刻要做到以下 6 點：

第一，加強問責制，積極及有效地回應市民的訴求；

第二，在制訂和落實政策時，仔細研究和反映民意；

第三，不斷提高效率，控制開支，善用資源；

第四，以民為本，改善服務的文化，與市民建立夥伴的關係；

第五，盡一切力量改善營商環境，特別是簡化審批程序，以及主動協助有興趣投資的人士解決問題，積極吸引投資；及

第六，在考慮所有政策時，時時刻刻把就業放第一位。

我同意我們的文化正在轉變。李議員只提出批評但沒有拿出辦法來，只有一個“彈”字，也不是辦法。這樣“唱衰”香港，對大家都沒有好處。我想說多一遍，我會聆聽社會上各種不同的聲音；支持我的，我會聽，反對我的，我也一樣會聽。重要的是，大家能放下成見，進行有建設性的對話，讓我們能真正地為香港做點事，以便須予以解決的問題，在我們詳細思考後，可以找到最好的辦法。這是我的希望，我亦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努力。

主席女士，我也會應立法會議員的建議，對其他兩個問題作出簡單的回應。第一，是關於香港民主發展的問題。各位，我曾經在英國及美國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我對西方的民主有充分的認識。我認同香港人對民主的重視。經過 5 年的實踐，我覺得按照《基本法》辦事是很重要的，因為只有這樣，社會才會穩定，以及得到平衡。對於 2007 年以後的政治體制發展，我沒有既定的立場，這個問題在適當的時候，會讓社會充分地討論，讓大家發表意見，以便從中找出大家可以接受的結論。

事實上，在過去四年半內，香港絕大部分市民最關心的是甚麼呢？在開始的時候，是落實“一國兩制”，要一絲不苟地執行《基本法》。現時市民關心的是甚麼呢？是“就業、就業、就業，經濟、經濟、經濟”。這便是我們現時的工作重點。我們一定要全力處理市民最關心的問題。回歸四年多以來，香港的民主一直在健康和穩定地發展。我們會努力確保它能繼續穩定和健康地發展。

主席女士，第二個題目是，有關內地和香港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安排。近 10 年來，內地經濟實在發展得非常好，我們要借助內地發展經濟成功的好勢頭，幫助香港的經濟轉型，增加經濟活力，以及製造更多就業機會。自去年年中以來，我向中央建議香港和內地建立類似自由貿易區的安排後，中央已作出積極回應，並同意今年 1 月開始進行第一次會議。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在 1 月 25 日率領特區的代表團到北京，跟外經貿和港澳辦的官員見面，就有關的建議正式啟動磋商。雙方在會上就初步的設想交換了意見，並確立了磋商的原則、工作模式和渠道。有關建議現在的名稱是“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雙方同意將來的安排要符合 WTO 的規則和“一國兩制”的原則，以先易後難，逐步推進的方式進行，並會廣泛諮詢兩地政界、工商界和學術界等的意見。雙方暫定於 3 月在香港進行第二輪磋商，在此之前，雙方高官亦會緊密聯絡，繼續就有關安排的內容預先進行商討。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質詢。如有需要，提出質詢的議員可在原本的提問獲答覆後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但只限於要求行政長官就答覆進一步說明。

主席：打算提問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有很多位議員希望提出質詢，已經有超過 20 位議員按鈕示意了。

第一項質詢。勞永樂議員。

勞永樂議員：主席，本星期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在香港考察後發表聲明，其中包括建議香港未來應開繳銷售稅。有人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斷症正確但“開錯了藥”；也有人說：如果不想香港變成阿根廷那樣，便千萬不要盲目聽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但是，無論如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香港的財政狀況已出現結構性赤字。我的問題是，行政長官是否同意這觀點？如果同意的話，有何辦法解決這問題？

行政長官：如果各位有詳細看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便會發現絕大部分的評語都是很正面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想再次強調，香港的形勢與阿根廷的形勢不同，最大不同之處是我們有財政儲備，而阿根廷卻欠下1,500 億元的債項。此外，我們有內地作為後盾，而阿根廷卻沒有任何後盾。第三點，一直以來，我們理財十分謹慎，而我們亦會繼續這樣做。

關於銷售稅的問題，我們首先要要知道，我們的確正面對着很龐大的赤字。今年的赤字很大，明年的赤字也許仍會很大，長此下去，肯定不是辦法。在現時經濟如此困難的時候，我們沒有太多的加稅空間，加稅之後經濟會更萎縮，不單止會對經濟增長不利，稅收亦會減少。所以，我們現時可以做的是精簡架構，但我很有信心，財政司司長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相信在5年內），可以達到收支平衡，我對這點很有信心。至於如何能達致收支平衡？我會留待財政司司長日後向大家詳細解釋。

勞永樂議員：董先生可否告訴我們，香港現時是否已出現結構性赤字？

行政長官：其實，不用問這問題，答案也是肯定的（眾笑）。香港一直以來也有結構性的問題，但無論是結構性也好，非結構性也好，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辦法解決呢？我可以告訴大家，是有辦法解決的。

楊森議員：主席，首先謝謝行政長官就李柱銘議員昨天的發言作出了簡單的回應。行政長官要求我們放下成見，不要只顧批評政府，要作出有益有建設性的建議。關於成見的問題，我不太清楚，可能行政長官對我們的成見也相當大。很多時候，我們想約晤行政長官也很困難。他的大門雖然是打開，但對民主黨來說，那道門卻深深緊扣。行政長官要我們提出建議，我想告知董先生，為了紓解民困，我們八黨一起提出了多項建議，其中包括寬減差餉、減稅、公屋減租三成及增加3萬個就業職位等。然而，行政長官有沒有聽取我們的建議呢？有沒有順應民意呢？當我們作出這些建議的時候，行政長官又有沒有回應呢？其實，董先生並沒有聽取我們的意見，因為他的成見太深

了。行政長官的心和行政長官的臉只是向着工商界，數碼港無須經過公開投標，便已批給某些人士承辦。

主席：楊議員，請提出你的質詢。

楊森議員：所以，我想問的是，行政長官究竟會不會在與財政司司長緊密合作下對八黨的建議，作出積極的回應，以紓解香港市民的困境呢？

行政長官：楊森議員，我真的很想跟你們交談。最近，我們其實是有很多機會可作互相溝通的，但你們卻不肯履行作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職責，不單止沒有出席有關的會晤，連跟我討論也不肯。我的代表甚至曾經致電個別人士。現在大家惟有再製造新的機會了。

楊議員剛才提到商界，令我感到莫名其妙，因為商界的朋友曾經跟我說：“自從你當了行政長官後，我們的資產已損失了 2,000 億元或數千億元”。大家都知道由於泡沫經濟爆破的關係，香港現時的經濟正面臨着結構性的調整。所以，楊議員這樣說，我真的感到莫名其妙。總而言之，我是四面受到別人的批評。不過，我知道，當做一件事做得正確，而四面受到批評時，即表示我走的路是正確的。（眾笑）關於八黨提出的建議，我知道大家一直在與財政司司長進行商討，我知道財政司司長正在研究。這問題並不簡單，因為我們正面對着這麼龐大的財赤。一方面，我們真的要關注財赤的問題，而另一方面，我們又要顧及民困的問題。所以，我想財政司司長正在積極考慮這些建議，當財政預算案發表的時候，大家便可以知道結果了。

楊森議員：我想說的很簡單，便是希望行政長官能積極回應八黨的要求。行政長官說有些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不履行職務，但我想告知行政長官，一般選舉的候選人是要“拜票”的，即使不在街上派發傳單，也要上門拜訪，而不是要求選舉委員會的委員拜訪候選人。我希望行政長官明白這點，也希望他能體察西方民主的意識，四出拜票。

行政長官：楊森議員，你認為我不想四出拜票嗎？其實，我是很想去拜票的，只是現在我們的民主才剛開始起步，不像人家那樣有一個規模很龐大的政黨在背後支持民主的過程。此外，我作為行政長官，要處理的工作實在非常繁多，所以，我相信差不多所有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均會體諒我的困境，希望楊議員也會諒解。

葉國謙議員：主席，剛才董先生發言時提到現時市民關心的是就業、就業、就業；經濟、經濟、經濟問題。香港現時經濟確實不景，服務行業更是首當其衝，很多中小型服務企業的經營成本亦相當重。有些飲食界的朋友說農曆新年過後，可能會有很多酒樓倒閉。如果真的這樣，一羣沒有甚麼技術的工人便會面臨失業。一些飲食業東主過往經常提及排污費問題。請問董先生可否考慮扶助一下這些中小型行業，豁免飲食業繳交排污費半年？據我所知，現時酒樓負擔了九成的排污費，每年大概要支付 2 億元。如果給予他們豁免，便可以解決從業員失業的問題，以及對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也有好處。請問董先生會否考慮這建議呢？

行政長官：關於飲食業，據我瞭解，租金約佔他們的收入 15%，其他管理開支包括薪酬及材料等多項費用，排污費只佔他們的整體成本 1% 至 2%，是 1% 至 2%。

總的來說，香港正面對很大規模的經濟轉型。在轉型過程中，我們要面對通縮。為何我們會出現通縮呢？其中一個最大理由，是因為內地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成本遠較我們為低，這包括薪酬成本、經營成本及租金等。在這情況下，他們能以較低的價格來提供服務，對我們一直構成壓力。這是基本的問題。我相信這問題要待數年後才可以獲得解決。

是否調整一下排污費便能解決問題呢？總的來說，我們就通縮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一直都在作評估，看看有甚麼更好的方法來幫助香港的企業。我相信不是單單調整一項費用便可以解決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問題便簡單了。我認為我們一定要看通盤的情況。

葉國謙議員：主席，董先生，問題其實可能在於董先生剛才所說的排污費佔他們的成本 1% 至 2%。事實上，他們的經營十分困難，所以希望能獲得一點紓緩。這是一個連鎖反應，市民始終要吃飯，即要在這方面消費，如果飲食業做得好的話，整個市面都會有不同的景象。請問董先生會否考慮給予飲食業這方面的紓緩呢？

行政長官：葉議員，其實該行業還有很多其他很迫切的問題要解決，例如數次打輸官司，幸福樓酒家便是一個例子。長遠來說，這是一個很值得大家憂慮的問題。因此，有很多問題是幫不上忙的，例如法律問題我們便幫不上忙。不過，如果在某些方面是我們做得到的，我們會詳細研究。

何秀蘭議員：主席，首先，我想告訴董先生，我們尋求的是對等、公開的對話和辯論機會。如果有這種場合的話，我們很樂意參加。我們亦不希望要抽籤或要行政長官破壞規矩，特別選出一人來對話，所以今天算是一個好場合。主席.....

主席：何議員，很抱歉，我想提醒大家，董先生今天是以行政長官的身份答覆議員有關政府工作的問題。

何議員，請繼續提問。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明白。我是回應董先生剛才以行政長官身份的發言，來發表我剛才的意見的。

董先生提出要與市民建立夥伴關係，我希望多知道一些這方面的詳情。這夥伴關係會否與政治任命有關？董先生是否希望透過政治任命，可以有自己的班子推動他的新思維？過往四年半是否沒有這種關係呢？過往四年半的施政窒礙，是否因為董先生缺少自己的班子，不能掌握民情；還是官員其實已能掌握民情，只不過民情未達決策中心而已？我希望董先生今天公開詳細解釋，政治任命及與市民建立夥伴關係這兩個概念的細則。

行政長官：何議員，與市民建立夥伴關係，是所有政府也應該做的事，所以我們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基本的做法是與立法會議員接觸、與區議員接觸、與市民直接接觸，以及多聽各個諮詢架構的意見等。事實上，在過去四年多以來，我們一直在聽，多聽便能更清楚瞭解，再加上與市民直接溝通，這方面的工作也是應該做的。

第二，有關問責制方面，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已多次向立法會議員解釋政府的方向。我在此可以說，在推行問責制後，我很有信心，問責制下的官員會更能掌握民意，與立法會的關係會理得更順，行政會議會發揮得更好。我相信政府在多方面會更有效反映民意，更有效推動各項政策。此外，在制訂政策前，亦能更好掌握民意。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想提醒董先生，與市民建立最直接的夥伴關係，當然是走出來直選行政長官，一人一票。即使是所有市民到他的辦公室聽他的政策，也是其中一個方法，最重要的是越多人一起討論越好。請問董先生考慮何時才會走出來，直接透過選票與市民建立關係；抑或應反過來問，董先生何時才會考慮這樣做呢？

行政長官：關於直選行政長官這問題，我剛才已說過，我現在想再次強調，我們會依照《基本法》辦事，一步一步進行。在未來5年內，不管由誰擔任行政長官，我相信他也應該在適當的時候諮詢大眾，多聽意見。我相信這樣一定會得出一個大家都可接受的結論，來推動這件事。

朱幼麟議員：主席，董先生，現時公立醫院的病人數目不斷增加，醫院管理局的開支也增加，估計今年的赤字超過2億元；但私家醫院的病人人數卻出現不足。請問董先生會否考慮加強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的合作，減低醫院管理局的開支？

行政長官：加強公營醫院和私營醫院的進一步合作是必需的。現時的趨勢，即到公營醫院求醫的病人一直增加，是不健康的，對政府的財政負擔不健康，對私營醫院將來的發展也不健康。很多人懷疑政府是否只關注公營醫院，而忽視私營醫院。我覺得有兩個理由證明情況並不是這樣。第一，政府的財政根本無法再這樣負擔下去；第二，這與我們的經濟理念是相反的，我們很希望私營醫院可以有所發展。

我很高興告訴議員，楊永強局長已成立兩個小組，一個有醫院參與，而另一個則有私家醫生和私營醫院參與。據我所知，他們已展開對話，我希望這些對話會得出實質的結果。

出現這樣的傾斜還有另一個理由，便是收費的問題。我真的覺得，有能力付錢的人到公營醫院求醫，實實在在是應該付錢的。這樣對改善這傾斜會有很大的幫助。

麥國風議員：主席，朱幼麟議員問了我想提出的質詢。行政長官，你近來因為多了巡區，所以民望似乎有所提升，而今天的信心也便加強了。其實，我兩次都是這樣說，你說的話是語重心長，很有原則，但似乎有心無力。我希望可以看到你繼續下去的施政會是有心有力。朱幼麟議員說公私營的醫療服務相當失衡，這對公私營醫院來說都不是好事。我今天曾與私營醫院的有關同事探討這個問題，大家其實也是希望爭取多一些。我想請問行政長官，他近來經常落區，有市民與他握手，令他信心大增，那麼他可否與我們這些員工握手，瞭解一下我們的苦況，讓我們的民怨沒有那麼沸騰？

行政長官：我是很樂意的。有機會讓我安排一下。

麥國風議員：那麼他的計劃是如何呢？

行政長官：暫時我說不出來，（眾笑）再跟你安排吧。

麥國風議員：是署長替他作安排？

行政長官：會是透過政府渠道一起安排。

主席：麥議員，其實你是可以將你的問題一併提出的。

周梁淑怡議員：行政長官，有關大家都很關心的香港經濟問題，現在看來似乎是要我們的經濟轉型，尤其因為我們是國家的一個重要城市。談到經濟轉型，我們現在很高興看到內地與香港有着更緊密的經貿交易安排。不過，這方面如果要成功，我相信是要符合兩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件：第一是要人才自由開放流通；第二是要消除現時的營運掣肘。既然政府好像已經掌握到時間是很重要的因素，而大家也知道政府是想盡快幫助我們的經濟轉型，但一如大家所知悉，不同的行業在內地經營是會有不同的掣肘和關卡；我想請問政府，究竟主動地做了些甚麼以瞭解各行各業的需要？我知道 3 月便會舉行會議，我們如何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促成經濟轉型呢？

行政長官：周梁淑怡議員，這個安排如果可以推動起來，我想對香港的經濟真的會是很有幫助，可為香港經濟帶來新的活力，從而對就業等各方面也有幫助。可是，我不希望大家低估了這個談判的複雜程度，這是需要一段時間的。我想強調，中央政府很重視這件事，亦正在積極推動。至於為何會是這樣複雜和困難，其實全世界的情況也一樣，每當開始進行貿易談判時，各方的既得利益者和各行各業本身都會有很多想法，所以會是比較複雜。在這個時候，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特區政府與各行各業接觸，以便瞭解它們的希望。與此同時，我亦呼籲香港各行各業主動地約見由梁錦松先生領導的工作小組，提出它們的問題和想法，以及告訴小組它們希望得到甚麼安排。這件事是要雙方積極地推動才可。在收集了意見後，我們會與內地有關方面商討。所以，希望雙方都可以就此採取主動。

周梁淑怡議員：行政長官，以零售批發界來說，我希望可以盡量諮詢到一些意見。我相信每一個行業的需要和所面對的困難都不同。鑑於時間是很重要，我很希望行政長官能向我們作出承諾，政府各個不同的負責單位或政策局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採取主動進行這件工作，因為如果政府不作牽頭，那麼營商的人是較難主動地走在一起的。我希望行政長官能夠盡量推動局長採取主動。

行政長官：這項建議很好，我會作出跟進。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我很多謝行政長官這麼快便對我昨天在本會的發言作出回應。這給了我們一個啟示，那便是如果想行政長官快點回應我們的意見，在批評時便要“勁”一點。（眾笑）

行政長官提到會在未來 5 年內（即包括 2007 年，因為現在已是 2002 年）進行政制檢討。在 2000 年 4 月時，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在本會曾答應大家，在 2000 年 9 月的立法會選舉後便會進行政制檢討，但很明顯，這件事後來被行政長官推翻了，現在更說要延至那麼遲才進行。市民其實已等得很心急，大家都想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的行政長官當我們的領導人，因為一旦有了認受性，每件事做來也會快很多。所以，我希望行政長官告訴我們，為何政制檢討還要等？孫明揚先生後來解釋說，要待 2002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及 2004 年的立法會選舉過後才進行檢討。明顯地，2002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董先生你必定會當選，因為沒有另一人可出來參選；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等了這一次的選舉，可學到甚麼呢？把政制檢討的時間推後，會對哪方面有利呢？

行政長官：李議員，諮詢的日期肯定不會是在 2007 年，因為那是太遲了，但也不會是在 2002 年，因為有諸如行政長官選舉等的事宜待辦。我們要看看甚麼時候會是比較適合進行諮詢。我現時沒有定論，那是第二任行政長官的責任。今時今日，我們應集中處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讓我再說一次，在適當時候，我們一定會進行諮詢。

主席：李議員，你是否想繼續跟進？

李柱銘議員：行政長官，當然，如果我們現在問市民，明天給他們民主好，還是給他們就業好，他們一定會答就業，但這兩樣東西其實很多時候是分不開的。行政長官的認受性是很重要。如果行政長官是由市民根據參選人的政綱，“一人一票”選出來，那麼他便是有認受性，得到市民支持，很多問題便會迎刃而解。所以，希望行政長官能盡快進行政制檢討。

行政長官：我不覺得我沒有認受性。我擔任第一任行政長官，由 400 人選出，我覺得已有認受性，因為那 400 人是依照《基本法》選我出來的。我們做任何事也必須按照《基本法》的。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希望透過你跟行政長官說，我最近向一些官員提出過幾個問題，是有關有數間從事 IT 行業的工廠將工序轉移往別的地方的事。這些工廠包括摩托羅拉和星辰表廠，它們均從事 IT 這類須具備較高技術的工業，而且一直是在香港設廠的。但是，我也知道行政長官曾說，要在香港搞工業是很困難的，因為我們的地價不及別的地方便宜、工資又不及別的地方昂貴——不對，應該是地價和工資均不及別的地方便宜，因此沒有競爭力。照我所知，政府近年來也說要搞高新科技。我們很難說高新科技沒有跟工業掛鈎，舉例來說，我剛才所說的摩托羅拉或星辰表廠也是經營一些須具備較高技術的工業，只不過它們將中下游的工業線移往別的地方而已。在這情況下，我們究竟應否讓現狀繼續下去，還是應考慮制訂一些有利於投資者到香港投資的稅務政策？這包括提供一些稅務優惠，又或是只要有人願意到香港發展跟 IT 有關的工業，政府便會有所鼓勵？政府有否作過這種考慮呢？抑或認為完全沒法可想的了，就是這樣的了。

行政長官：陳議員，我要分兩部分來回答你這項質詢。

第一部份是有關創新科技發展的方向。最近，創新科技委員會的黃主席 (Eugene WONG) 曾向政府作這樣的建議：香港最重要的是發展香港的優勢，香港要在現有的優勢上發展創新科技的方向。他提出兩方面的建議，一方面是，香港是一個很有成果的服務中心，所以在創新科技方面，應以服務業為主的，還應考慮有甚麼可以協助服務業更科技化；經過科技化、經過創新，來提高自己的效率，因此，香港在世界上佔有一個很特殊的地位。與此同時，由於發展了科技之後，便可以將這些新科技的構思出售予別的地區。他覺得我們這個發展方向是可以成功的。這是第一個發展方向。

第二個發展方向是，他說香港一定要在科技上作投資，他提及應投資在兩三個地方。他認為要跟其他國家或地區競爭，卻不肯投資在科技方面，便是浪費資源，不過，當然應視乎我們在甚麼地方存在優勢，而我們便應投資在那些優勢之上。他建議在哪些地方投資呢？首先，他建議在生物(bio-medical)方面投資；其次，他建議在 IC 的設計上投資。他認為投資在這些方面對香港將來會有好處。第三，他提到 nanotechnology。呂議員，這詞的中文名稱是甚麼呢？

主席：行政長官，是納米的意思。（眾笑）

行政長官：Nanotechnology。他認為第三方面應該在 nanotechnology 上投資。他表示，由於香港已經凝聚了一羣世界級的人才，就此方面發展，對香港會見效更快。

此外，其他地區或國家在這些方面的發展也不見得很先進。他說既然香港已有基礎，便應基於這些基礎上再發展。對於這方面的建議，他仍在進一步研究中。我相信他最後提出來的建議，一定會很好的。

一直以來，我們也知道，香港要在工業方面跟深圳、東莞、廣州和上海等地競爭，從多方面考慮後，我們是做不到的，因為那些地區的地價和工資也很便宜，而且土地又多。但是，我也曾說過數次，香港政府有否一項工業政策呢？是沒有一般性的工業政策的。但是，如果有一項工業，第一，香港是有優勢的；第二，可以為香港帶來經濟動力的；及第三，能創造就業機會的，我相信政府一定會坐下來跟大家討論的。所以，我們雖然沒有一般性的工業政策，但如果有一項工業能具有以上我所說的條件的話，是可以度身訂造的。我當了四年半行政長官，但我至今仍沒有看過有這樣的工業可以提出來討論的。

陳婉嫻議員：行政長官，我是看過，你也是看過的，不過，政府沒有聽我們說，那便是我們應利用河套區或開發我們的邊界。因為我們北部邊界的土地跟深圳的差不多，我們可以在其中建造一些例如中藥港，這類工業既可以利用國內的技術，也可以令香港的工人在一些下游的工業中就業。不過，問題是整個政府，或可能由於你，覺得我們要向你提供一項可以賺大錢的，要很多人做的工業，才算得上是具備該等條件的工業。我想當然很難會有這些工業，但是，我想，我們可以利用我們邊界河套區的特點，以及我們現時在土地跟上海差不多的時候，作出一些考慮呢？我覺得我們是否有些地方僵化了，不考慮便不考慮了，是否這樣呢？主席，我想透過你問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陳議員，事情並非如此的。有關河套區的海岸和禁區的發展，我們正在研究中，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無論如何，我們須有較長的時間，因為要發展這些地區時，我們要有完善的道路網和水電供應等，是有很多問題存在的。我們不是沒有進行研究，是有的。第三點我想說的是，對於這些發展，政府可以做些甚麼呢？政府可以做的是，如果要發展中藥，又或是要發展製衣，無論要發展甚麼也好，可以先提出意見，但事實上，沒有企業提過。我們反而經常請企業想一想；往往是企業經過盤算後認為無利可圖，便不作出行動了。不過，我們會再盡一切力量、再想辦法，吸引更多人來香港投資，又或吸引已經在香港的人投資。我們會盡量做的。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想向行政長官提問有關高官問責制。行政長官在承諾中說過會在7月實行此制度，當然，我們估計行政長官會連任，那麼7月便可予實行。我想問，會否就高官問責制公開諮詢呢？如果不會，為何不會呢？如果會的話，時間似乎太緊迫，會趕不及了。同時，行政長官估計牽涉的額外開支會是多少呢？此外，我還想問一問，有一些特別職位，例如律政司司長的職位，是比較敏感的，會不會有一些特殊的考慮呢？

行政長官：你提起律政司司長的職位，我會按照《基本法》辦事。我不覺得須有甚麼特殊的考慮，我是研究過這個問題的。關於經費方面，最少至今我還未看到該階段的研究，我相信在適當的時候我會知道，而大家也會知道這件事最終會如何的。第三點，在過去多個月以來，政府一直與立法會就這問題進行溝通，所以一定會諮詢的，而我們也會持續諮詢的。我想再強調一下，我個人覺得這個問責制對將來的行政長官，不管是誰做行政長官，以及將來的特區政府都會是一項很重要的安排，因為此安排能使一批高官確切的向市民問責，能加強立法會與行政架構的溝通，亦能把重組後的行政會議（即我剛才所提及）發揮更大的效率。對各方面來說，這都會是一件好事。我亦相信就此我會得到市民大眾的支持，亦得到你們的支持。

余若薇議員：主席，董先生剛才說的諮詢是與立法會進行的，但我想問的是向公眾的諮詢，因為剛才董先生也說過，高官問責制會有很深遠的影響，亦會影響着整個行政會議與行政架構。一件既然影響如此深遠的事情，亦會牽涉一個比較大的經常性開支，為何董先生認為無須進行公開的諮詢呢？同時，律政司司長這個職位，是戴着很多頂帽子的，出掌此職的人須向政府提供法律的意見，但很多時候，政府的立場或司長法律意見，與公眾利益卻未必一致，而律政司司長又要牽涉入最終要控告或不控告某人的決定中，我們也曾看過一些個案，例如胡仙事件，其中是會牽涉一些政治的因素；縱然你說沒有，但別人總會懷疑其中是會涉及政治色彩的。既然此職位是這麼敏感，又牽涉這麼多可能會有的衝突.....

主席：余議員，很抱歉，現在是行政長官答問會時間，並不是在進行辯論。請你在提出跟進質詢時盡量簡短。

余若薇議員：我知道，所以我想問行政長官是否已考慮過這些全部的因素後，仍然認為該職位無須作特殊考慮呢？

行政長官：其實，在這方面，我是考慮過的。很多人都很崇拜美國、英國的政府架構，不過，你知道，我亦知道，在美國、英國，Attorney General是由誰委任，這些我們全都看過了。第二點，我們會按照《基本法》辦事，我覺得直至現在，律政司司長一向發揮得很好。關於你剛才問及有關諮詢的安排，我不知道政府裏的同事最終會怎樣安排，據我所知，我們會一直與立法會商討，不過，我們也一定會有好的安排來諮詢大家的。

楊孝華議員：主席，在行政長官和政府的推動下，成功游說內地放寬香港遊的配額，目前該措施已經開始奏效了。在昨天，以往沒有香港遊配額專利的公司舉辦了第一團來香港，而下個星期很多酒店房間亦已訂滿了。

我想請問行政長官，你說過你會與內地再行商量，研究可否發出多次簽證予來港的商務旅客。你會否考慮與內地商量，除了商務旅客外，給予一些入息高、有良好紀錄、曾來過香港而沒有逾期居留的、有穩定職業的人，不一定須以商務旅客身份，即以旅遊為目的也可以，給予他們多年有效、多次來港的通行證，從而更進一步的促進香港的旅遊事業？

行政長官：楊議員，我們一步一步來做。去年已經有440萬名內地人士來香港。今年，我們可以看見放寬後，內地來港的人數真的增加了很多，我希望人數一直增加下去。至於下一步，我很希望日後來港旅遊、商務旅遊、或是其他的個人旅遊等的人士，無須經過旅行社的安排，或即不須經過團體的安排但仍是透過旅行社購票的個人，均可以隨自己的喜好來香港旅遊。如果可以做到這一步，便是一項很大的突破。在這方面，我們正很努力的在爭取。待爭取得這一步之後，我們便會再看看怎樣走第二步，作一步一步的爭取。

楊孝華議員：行政長官，你說會一步一步的爭取。其實，我們只是希望爭取多些以個人身份的旅客，故不一定須一刀切的。行政長官又會否就此作考慮

呢？我研究過一些國家的做法，包括香港人經常前往的澳洲、美國和日本，他們所發給的簽證，都是因人而異。例如美國可以給予 10 年有效簽證，亦可以給一個月限期的一次簽證。對於來自某些國家的單身女士，我不便說哪些國家，一些國家只會發給單程簽證，但是，另一些卻可能給予 3 年簽證。行政長官會否考慮，就很多國家已實行視乎旅客個人情況而予以簽發不同形式的旅遊證件作入出境之用的做法，將事實向內地反映，供他們參考這些方法？

行政長官：這是很好的建議，我會向內地反映。

張文光議員：主席，董先生，四面受到批評，並不一定等於你是做對了，有時候，可能是由於你出錯而引致四面楚歌的。400 人的選舉團始終不及 700 萬人選舉的認受性，批評有時候是有用的。不過，無論如何，我想問一項董先生最關心的教育問題。董先生，最近你就新精英主義發表的演辭中提到精英和直資掛鈎，但我不知董先生知否有些名校轉為直資後，學費越來越昂貴，小學收取 4 萬元，中學則收取 6 萬元。有人計算過，如果一名學生由小學升讀至中學預科，單是學費便合共要付 66 萬元。你覺得一個普羅家庭，甚至一個中產家庭，是否能負擔得起這筆費用呢？如果名校轉直資後變得貴族化，會否為本港帶來階級分隔，這樣對香港來說又是否一件好事呢？

行政長官：張議員，關於這個直資問題，我曾與率先開辦直資學校的有關人士傾談過，因為我很關心此事。我亦問過為何每月學費（對不起，是每年學費）要 48,000 元這麼昂貴呢？所獲得答覆是：首先，該校可能要增加教師薪酬；第二，每班學生人數減少了；及第三，亦是很重要的，如果學生父母無能力（或無財力）負擔學費，他們可以申請助學金 — 就該校而言，全校領取助學金的學生人數達 30%。所以，學校也考慮到這些問題，亦願意讓無能力負擔高昂學費的學生在該校讀書。我認為有這安排是十分重要的。

談到精英問題，我亦想澄清一下，因為有很多人說，我既然談及精英，這是否與教育改革方向有所不同呢？其實並非如此，教改方向是“拔尖補底”，社會一定要有精英，由精英領導社會、由精英領導企業、由精英領導任何一個組織。但是，教育亦一定要普及化，讓每個人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變成精英，無論他的身份、背景如何，也須有平等的升學機會，以力爭上游。這便是最好的安排，我亦相信這是香港的目標。

張文光議員：董先生，如果在一所學校裏，要由眾多富裕學生集資幫助貧窮學生讀書，很多貧窮家庭可能一開始便不會選讀這所學校，因為這所學校已把他們的子弟拒諸門外，而他們的子弟亦未必想“陪太子讀書”。然而，更關鍵的問題是，張建宗先生也說官校已準備轉為直資。如果香港補助學校、資助學校，甚至官校也走向名校直資的道路，你覺得這樣對香港普羅學生是否公道呢？這會否削弱他們入讀名校的選擇權呢？況且，香港教育可否一方面走貴族，另一方面又走平民的路線呢？這是否你所期望的教育改革呢？

行政長官：絕對不要說走貴族或平民的道路，我們是要確保無能力的學生仍然可以升讀直資學校。

主席：張文光議員，很抱歉，提出質詢的議員只可以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

楊耀忠議員：董先生，在過去 4 年裏，你對教育的承擔是有目共睹的，但與此同時，我們亦看到不少中產階級的家庭對我們的教育制度漸失信心，其中很明顯的表現就是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國際學校就讀，或將他們很年幼的子女送往外國升學。有些中產階級人士甚至向我表示，如果要移民的話，可能就是由於對香港教育制度有所不滿。我想請問行政長官，你可有甚麼辦法恢復或挽救這批中產階級人士對香港教育制度的信心？

行政長官：楊議員，其實，就以過去 10 年 — 即九十年代來作討論。在 90 年初，香港的所謂名校大概有三十多所。剛才張議員也說，名校有三十多所，即是說，直到現時為止，亦仍然只有這三十多所的所謂名校。但是，在過去 10 年裏，中產階級的人士卻增加了很多，所以，我們根本就是沒有足夠的好學校。我希望透過直資或其他的安排，盡量能夠產生多些好學校，政府真的很希望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沒有這樣的發展，難怪很多中產階級人士對香港的教育制度不滿意，因而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國際學校或送往外國升讀。就這方面而言，楊議員，你亦是從事教育的，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努力，多想出一些辦法來看看怎樣可以做得更好。政府必定會支持的。

楊耀忠議員：董先生，你剛才提到在香港，好學校的數量在過去 10 年來都沒有多大變化。我不知道你有否考慮過要改變中產階級家庭對好學校的定義，而可能藉着這種的改變可令他們找到合適的學校呢？

行政長官：這點亦是對的。其實，我知道教育統籌局和教統署亦正就這方面努力，希望大家都會朝着這個方向努力。這是正確的。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還有 2 分鐘便已經進行了一個小時的答問，但仍有 11 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

請問行政長官可否多給我們 15 分鐘，好讓多數位議員能提出質詢？

行政長官：好的。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請各位有機會發問的議員，在提問時盡量精簡，好讓更多議員有機會發問。可能我主持今天會議時處理得不太好，以致讓你們的提問過長了。（眾笑）

鄧兆棠議員：主席，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公司”）的補貼事件受到社會人士的廣泛關注，而較早時平等機會委員會亦傳出延長“自己人”的聘任時間，即雖然有高層職員已屆退休年齡，但亦延長他的聘任時間。我想請問行政長官，有甚麼辦法可加強監管公營機構以提高其問責性，以及確保公帑能得以有效運用？此外，怎樣可令人事聘用機制更公平公開，為市民所接受？

行政長官：鄧議員，九鐵公司所運用的金錢是公帑，即市民的金錢，所以我們不可以浪費，必須加強監管其運作，政府是有這個責任的。當然，政府最重要的責任是找到好的人選當家；政府另一個責任是時時刻刻均應監察機構的運作。不過，董事局也很重要，因為既然是一間具規模的公司，便應有一個董事局，而董事局是有特定責任的。我們所行的第一步是把主席和總裁的職責分開，理由是希望董事局可以加強監管。我相信在行出第一步之後，應該能夠發揮更好的效益。總括來說，對所有公營機構，政府是有責任挑選理想人才擔當重要的職位。政府在這一方面會繼續努力。我亦想在此一提的是，有人就薪金方面提出了很多意見，我們其實亦正研究有關薪金水平應如何，我們會通盤地看這問題。

鄧兆棠議員：主席，我想提出跟進。董事局成員大多數是兼任性質而非全職，而行政部門的職員卻是全職的。政府如何把行政部門的消息全部傳達董事局呢？我想這是十分困難的事。政府會否把這些機構納入審計署的範圍內，查核所花的錢是否 *cost-effective*，是否真的有成本效益呢？

主席：鄧議員，我想是衡工量值的意思。

行政長官：鄧議員，現時我並未考慮由審計署調查有關帳項，但我想重申，董事局已經委聘局外人士負責調查有關帳項，我呼籲大家在還未得出結論前，不要猜測究竟這是甚麼一回事，因為這是十分不公平的，待調查完畢後，才作結論吧。

劉健儀議員：主席，在北京剛結束的粵港官員以及中央計委會議中，大家同意盡快興建連接廣州、深圳和香港的區域快線，並且由中央鐵路部門統籌。想請問董先生，於去年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上所達成的共識，包括聯手開發南沙港、投資珠海機場、加強彼此在發展物流服務的協調等，會否加入中央協調的因素，以便粵港兩地之間能夠盡快開展其他合作發展項目，促進香港的經濟呢？

行政長官：劉議員，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基礎建設方面，我們關心的是幾方面。

第一，我們不希望浪費資源，不希望看到彼此爭先興建，霸佔地盤，如果進行重建的話，會浪費很多資源，對大家也沒有好處。

第二是涉及接駁的問題。我們希望有關發展能令香港和內地都好，能夠帶出最好的經濟效益，以及將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經濟拉近。

第三是為了香港的未來，我們須確保香港在物流方面的優勢，香港物流中心的優勢是很重要的。因此，我提出一項建議，希望我們與珠江三角洲一起通盤協調。以前的協調方式是，香港這樣興建，內地便那樣興建，但不知兩地能否接駁。現在的協調方式，會進一步考慮經濟效益，考慮到有關發展對內地怎樣，對香港又如何；考慮到為何內地要這樣興建，為何香港要那樣興建，大家有沒有辦法做得更好等，是這樣作通盤考慮的。中央很重視這件事，所以把協調工作交給計委處理，亦要求第一時間跟香港方面開會，曾司長亦因此於上星期前往北京，為這事出席第一次開會。劉議員剛才提及機場、碼頭等，所有有關事項都會在這場合中得到商討。我覺得這是一項很好的發展，我希望香港的物流優勢能夠一直維持下去。

劉健儀議員：主席，內地港口的發展，過去幾年都以雙位數字上升；本港的貨運在碼頭方面只有單位數字上升，去年更掉頭回落，業界對此非常擔心。

請問董先生，協調港口和機場方面的發展有沒有時間表呢？若有，業界便可早點知道如何計劃未來，大家亦可有較全面的盤算。

行政長官：劉議員，我想應該是有時間表的。我想在此一提的是，不錯，內地的增長是高一點，但內地的基數低很多，香港的基數是很大的。所以，兩地的增長，一個是雙位數字，一個是單位數字，這是意料得到的。

此外，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照大家所說，外貿在 10 年內會以倍數增加。如果珠江三角洲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聞名的生產基地，而這個生產基地也能將其生產加一倍的話，對香港和內地港口均有好處，大家忙於營運，可能機場也應付不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最重要的，是香港的關卡時常保持暢通，這樣成本才可降低，對香港才有利。這些都是我們現正進行的工作。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九廣鐵路公司（“九鐵”）的問題，我仍然感到有些意猶未盡。九鐵最近發生一連串風波，激起了一定程度的民憤。當然，最近焦點已轉移到將來的沙田至中環線的投標是否公平的問題上。所以，這方面的事情其實已不可以再拖延，我希望董先生關注這件事。但是，關於董事局成員的問題，其實並不只是限於主席與行政總裁分家的問題，而是涉及改組的問題，即現時的架構有一定的傾斜性。董先生會否考慮進行大刀闊斧的改組工作，加入一些具更廣泛代表性的人士，以及將來在推行所謂的高官問責制後，高官與這類機構的關係為何？

行政長官：九鐵是一個法定的機構，有本身的職責。當然，九鐵也須向政府負責。另一方面，劉議員問會否推行進一步的改革呢？我相信最重要的改革是我們把主席及行政總裁分為兩個職位，這是一項很重大的改革。當然，這項改革推行至今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我相信須給主席一段時間來瞭解及研究運作的情況，然後他會向政府作出建議。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想董先生回應有關沙田至中環線的問題。其實，當局原定在去年年底便公布投標結果，市民現時也希望快些知道結果，請問當局何時才會正式作出公布呢？

主席：劉議員，這並不屬於你剛才質詢的一部分。

劉江華議員：主席，但我的問題是有提及這方面的。（眾笑）

行政長官：我們會盡快公布。（眾笑）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請問行政長官是否有必要把律政司司長一職納入高官問責制之內呢？這做法有甚麼好處是現時的安排不可以達致的呢？大律師公會對這項安排表達了很多疑慮，主要是認為可能會削弱這個職位的公信力，即有關其獨立性的公信力，以及市民對司法公正的信心。所以，我最要想問，建議有甚麼重大的好處是現有制度不能達致的，以致須這樣做呢？

行政長官：我剛才已提及，提出這項安排，是基於數項考慮的。第一項考慮是，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也有相同的安排，這並沒有甚麼特別不妥之處。香港採用這項安排，也沒有甚麼特別不妥。第三點是，其實我們完全是按照《基本法》辦事的。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我的質詢是，有甚麼好處是現行的安排不能達致的呢？行政長官雖然提及其他國家，但其他國家有全民普選的國會，也有全民普選的政府，香港的情況是不同的。我主要的意思是，一方面有人表達了疑慮，另一方面，是有甚麼好處呢？現行的制度有甚麼重大的缺陷，因而非把律政司司長的職位納入新的問責制不可呢？

行政長官：我看不到有甚麼壞處。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想就房屋政策提問。很多人批評政府的房屋政策不清晰及搖擺不定，但自去年 9 月以來，反對的聲音開始減少，甚至今天在議會內也沒有人提出這方面的問題，直至現在才由我提出這項問題。去年 9 月，曾司長使出一式絕招“曾一刀”（眾笑），由那時開始，市場便穩定下來，雖然二手市場樓價沒有上升，但也沒有下跌……

主席：石議員，請提出你的質詢。

石禮謙議員：……這“一刀”一切便切斷了……

主席：石議員，你的質詢是甚麼？

石禮謙議員：……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停止了出售居者有其屋（“居屋”）單位。我想問，鑑於現時的樓宇市場已穩定下來，新樓價格開始上升，政府會否在 7 月延長停售居屋的時間呢？因為這對市場會有很大影響。

行政長官：石議員，你給了我一個機會談一談房屋問題，我也希望會有人問我有關房屋的問題（眾笑）。我一直很失望馮檢基議員不在場（眾笑）——我想，政府的房屋政策為很多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了合適的和可以負擔得來的居所。政府於去年清拆了全部臨時房屋和平房，那些居民已遷入較良好的居住環境，公共房屋（“公屋”）擠迫戶亦減少了一半以上，很多寮屋居民也獲安排入住比較新的公屋單位。由 1997 年至今，有 22 萬個家庭透過不同途徑遷入公屋，平均輪候期從 7 年減至 3.8 年，而長者的輪候期則由 4 年減至 2 年。所以，我相信從任何角度來看，政府在房屋方面其實已做了很多工作，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 1998 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的泡沫經濟爆破，樓價開始暴跌，所以從 98 年開始，政府只有一個目標，便是穩定樓價，沒有其他目標。我們採取了很多措施，在 98 年採取了停止賣地的措施，然後又採取了減售居屋，以貸款代替的措施，最近又採取了停售居屋的措施，目的是甚麼呢？是希望樓價穩定，只有這個目的。為何樓價穩定這樣重要呢？因為樓價穩定對經濟穩定是太重要了。

至於剛才石議員問，到了 7 月份，究竟在居屋方面會怎樣做呢？我知道曾司長已表示，會在 7 月就房屋架構及將來會如何處理居屋的問題，作出交代。我知道他正在進行研究，所以我現時無可奉告。但是，我相信他會就這方面進行很詳細的研究，並會考慮各方的利益。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想問，會否讓現時正在輪候公屋的 9 萬個住戶入住現時空置的居屋單位，讓他們可盡快上樓，同時無須因為有居屋單位空置而須出售居屋呢？

行政長官：我不能就個別具體的想法作答，但我相信曾司長會考慮所有因素。（眾笑）

主席：各位議員，今天可能會令其他不能提問的議員失望了。謝謝行政長官在今天的會議中，回答了 18 位議員的提問。

在今天的會議中，我想對辛勤勞碌的行政長官、各位辛勤勞碌的官員及各位辛勤勞碌的議員說，希望你們有一個愉快的春節，我想如果大家可以藉此機會度假或休息一下，也是好的。（眾笑）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2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19 分休會。